

[SUFU-IAR-201005]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2010 年度政策建议书之五

关于充分重视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建议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

2010 年 4 月

政策建议要点

现状:

对商学和现代经济学科研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尽管学科的生源数量最多(几达所有学科的四分之一)、质量最高,但与此极不相称的是,研究投入不足(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例,管理科学部在所有7个科学部中每年受资助的金额还不足5%,每年国家社科基金总额更是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总额的10%),培养出的高层次经济、金融及其他商学人才严重匮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全面接轨世界以及自身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症结:

- (1) 教育理念相对落后,学科封闭发展脱节。
- (2) 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基金学部划分缺失。
- (3) 整体师资力量薄弱,课程体系设置落后。

建议:

(1) 将作为商学重要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序列中分离出来,与商学一道纳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序列中去,将现有的管理科学部扩充为经济与商学科学部(或经济与管理科学部)。

(2) 加大对于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科研的支持力度,扩大受资助范围和人数,并在科研评审中大幅增加国际同行评议的比重。

(3) 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高层次商学人才培养基地,聘请一批国际名校一流师资授课,培养掌握现代商学和经济学前沿理论、技术、工具和方法,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惯例,精于本土化运作的与国际接轨的大批高端人才。

关于充分重视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建议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

中国正处于重新崛起这一最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和发展方式转变，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商学和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性辨析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不难发现，中国要真正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强国和先进发达国家，就离不开世界一流的商学和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作为支撑，而其核心指标之一就是能否培养出大批具有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经济、金融、管理、保险、贸易、营销、会计、商务等方面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商学是以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商业行为和商业现象及其商业活动的一门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自成体系，与传统的财经学科、政治经济学及以工程背景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科都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稳步发展，为不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和提升国民创富能力，指导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人力资本支撑。时至今日，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速度最快、在校学生最多、生源质量最好的学科之一。截止 2008 年底，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类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已占全部在校生人数的 24.16%，近四分之一。

然而，与这一现象极不相称的是，各方面对商学和经济学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视还非常不够，研究投资不足。尽管学生素质一流，但由于课程体系落后，大多教师水平低下，没有受到正规的现代经济学和商学教育，使得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规模庞大，但质量却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国家对高层次经济、金融和其他商学人才的需求，且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最大“短板”之一。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利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完善，从而有可能阻碍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少数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的确可以靠引进解决，但是大批紧缺的高端商科（如金融）人才还是亟待自己培养。并且，商学和经济学教育的正负外部性都非常大。可以说，没有现代商学和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启蒙、发展、传播和应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

国改革开放可能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反之，如果（现代市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商学被决策者误解和误用，其政策后果则可能带来巨大经济灾难，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证。

这迫切要求我们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重视和科学规划我国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根据笔者的观察，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之所以一直难以培养出高层次创新人才和贡献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是因为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三大突出症结。为此，笔者提出了破除问题症结的三大基本建议。

一、三大突出症结

影响和制约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但笔者认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主要是以下三大亟待破除的突出症结：

症结 1：教育理念相对落后，学科封闭发展脱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商学和经济学教育发展曾出现一个断层，传统财经教育的培养重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经类国民经济从业人员。改革开放直至近年，大多高校的经管学院的主体学科基本上是以工程背景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科，大致对应为国外大学工程学院中的工业工程管理学科（management in industry engineering），而国内经管学院的早期教师也基本上是由工科背景的教师转行过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则是最近十来年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

尽管如此，现代商务管理教育理念依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缺乏与国际接轨的良好办学理念及与之配套的体制机制，使得我们培养出来的仅仅是中低层次的经济、金融和其他商学人才，普遍缺乏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能力，最后真正成为高端人才的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改革开放和驾驭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症结 2：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基金学部划分缺失。这与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科研资助序列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现代经济学作为商学的根源和重要理论基础，基本被划入到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科研资助体系，一直得不到充分重视（目前，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总额还不及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总额的 10%，现代经济学课题的立项数再多，也是僧多粥少）。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是非常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现象，强调从假设到推理再到结论的内在逻辑，强调用数学和数理模型作为基本逻辑分析工具，强调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证性和自然科学性，与其他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大不同。这也许是经济学和商学能够在改革开放

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其作用得到各界公认的原因之一。

另外，我国现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体系及其科研资助序列是 25 年前（1986 年）设立的，尽管当时添加了管理科学部，但如前所述，它并没有涵盖真正意义上的商科的全部内容，尽管有工商管理类的资助范围，但是由于评审和评议专家中国际同行的比例过低，使得评价体系迥异，大多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学科方面的海外归国人员很难拿到资助。即便如此，以面上项目为例，无论立项数还是资助金额，管理科学部在所有七个科学部中都居于末位，占比均不到 5%。这与商学和经济学的人才培养规模极不相称。并且，作为商学重要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却被划入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学科分类体系及其科研资助序列，即使有一些课题能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总体科研投入还是严重不足。这样的学部设置已经不能反映国内商学和现代经济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学科高速变化趋势，落伍于时代的发展需要，亟待做出适应性调整。

症结 3：整体师资力量薄弱，课程体系设置落后。尽管目前经济、管理类专业几乎遍布国内每一所高等院校，但与之配套的教师队伍的建立和成长并没有很好地跟上来，普遍存在知识陈旧、研究方法落后、交流创新不足等问题。即使是国内顶尖大学的教师队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任何其他自然科学大得多。

这当然与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才短短十多年时间，真正接受过正规现代经济学和商学教育的师资储备不足有关。缺乏一支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站得住脚的优秀教师队伍，课程体系设置的合理性及前沿性自然也难以得到保证，大多数高校的师资力量都不足以支撑开设与国际接轨的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前沿、高级课程，这严重地阻碍了商学和经济学的教育、研究与应用。没有优秀的一流人才走上基层教学岗位，培养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只能是奢谈。

二、三大基本建议

在现有环境下，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要取得大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积极务实而灵活高效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破除上述这些突出症结，就此提出三条建议措施：

建议 1：将作为商学重要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序列中分离出来，与商学一道纳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序列中去，将现有的管理科学部扩充为经济与商学科学部（或经济与管理科学部）。

一方面，将现代经济学与商学一道纳入国家自科资助序列，也许可以减少因担心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不必要干扰。另一方面，扩充现有管理科学部则是按国际标准建设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学科的需要，也是借鉴了“千人计划”的学科分组评审办法。

如果担心这样的调整幅度过大，退而求其次，可以将管理科学部扩充为商学科学部，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将现代经济学单列资助。总之，无论将现代经济学归入哪个体系，都应该更加重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像任何一个学科一样，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商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的商科、经济学科和其他方面的人才，国家建设就没有高水平人才可用，长此以往，国家的兴旺发达从何谈起，最终将会受制于人。

建议 2: 加大对于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科研的支持力度，扩大受资助范围和人数，并在科研评审中大幅增加国际同行评议的比重。

商学和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必然是建立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这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扭转学生规模近四分之一，而研究投入却处于边缘地位的极不对称现象的需要。近些年来，国内许多一流高校引进的大批高层次的海归教师，但由于学科划分的不合理，基本上处于非国际标准同行评审状态，致使大部分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方面的海归优秀人才的前沿重大课题拿不到资助，这非常不利于真正地留得住和用得好海外高层次人才。为此，应该在有关科研项目特别是国家级课题申请的会议评审环节，大幅增加国际同行评议的比重。

建议 3: 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和本土师资培训力度，整合政府、高校、社会等多方面资源，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师资队伍集聚和人才培养平台。

目前，尽管一些地区和高校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不免存在零星分散、各自为战的现象，缺乏国家层面的指导和引导。笔者就此提出 3 点具体建议：

(1) 依托“千人计划”这样的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更多地引进一批商学和经济学教育领域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海外学术领军人物。

如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领军人物的办学理念、学术水平、眼光视野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学科、学院乃至学校的整体建设水平。目前，“千人计划”在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领域内引进的领军人物相对较少，短期看引进这类人才没有直接引进行业创新创业人才见效快，但教育是有外部性的，长远看投资收益会更大，有助于带

动国内同类教育领域内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真正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规律和运行机制实行全方位的教育改革。

(2) 依托重点高校的商学和现代经济学优势学科，面向全国高校同类师资，举办各种形式和时间长短不一的高层次师资培训班，国家给予常规性的项目经费投入。

根据需要，培训时间可长可短。短至一个月左右的高强度暑期课程进修或培训班，长至一到两年的全脱产回炉深造，授予学位。当一个训练有素的教师回到所在学校，就会将商学和经济学教育理念和前沿知识贯彻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管理等一系列过程中，受益的就不仅仅只是教师本人，而是成百上千个学生。

(3) 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高层次商学人才培养基地，聘请一批国际名校一流师资授课，培养掌握现代商学和经济学前沿理论、技术、工具和方法，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惯例，精于本土化运作的与国际接轨的大批高端人才。

高层次商学人才培养基地可以新建。当然，为了节省成本和见效快，可以将国际化办学，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海归教师多的学校作为培养基地，采用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学校共建的方式进行，培养高层次商学人才，有重点地对高校教师、政府公务员、行业精英等进行培训。这将是一个具有极大正外部效应的战略性举措，有助于形成对国内传统高校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有力竞争和补充提升，推动国内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上述建议的一个成功实例，我们上海财大近 5、6 年来，以世界一流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系作为参照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通过大批引进海归优秀人才，加强学科建设和改革课程体系，狠抓教学和科研，实行了全方位的教育改革。为此，学校先后引进多达 7 位的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担任体制内实聘院长，并大规模引进海外知名大学博士，使得在全校教师中海归博士的比例为 19% 左右，近五分之一，笔者所担任院长的经济学院更引进了近 40 名海归博士，达到 55% 左右，率先实践了国家重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发展战略。

短短几年间，学校在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方面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学生就业留学、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从国际研究成果看，经济学院基本达到了北美五十名左右研究型大学经济学院（系）的水平。同时，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即依托强大海归师资阵容，自发三年来连年举办现代经济学暑期师资进修班，按照北美前 20 名研究型大学的现代经济学课程体系和标准授课，已有 130 多所高校的近 500 名教师接受培训。

附：田国强个人简历及工作业绩

个人简历

田国强，1982年获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其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之父”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1987年被聘为美国德州 A&M 大学经济系副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1991年被破格提前提升为副教授并获得终生任期教授资格(Tenure)；1995年被提前提升为终身任期正教授。

田国强教授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院长，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及评审专家。目前，田国强教授还担任着多个国内外学术期刊的共同主编或编委。

工作业绩

田国强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的社会科学领域华人学者中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对 1990-2000 年全球最著名的 1000 名经济学家排名中，按照论文数量排名第 185 位，按照论文页数排名第 220 位，按照论文被引用次数排行第 504 位，总体排名第 282 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 4 位。

田国强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理论、激励机制和制度设计、转型经济学、中国经济、幸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对策论、动态最优化理论等。在这些领域里，特别是激励机制和制度设计、数理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对策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现有近百篇论文在包括国际一流期刊在内的经济学和数学学术期刊上发表，有 9 篇论文在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十四册)曾获得 1994 年度“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大奖。

田国强教授 2004 年 7 月受聘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由其倡导的“经济学创新平台”项目以聘任海外院长担任实职院长、大量引进（达 39 位）海外优秀博士，在对照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标准狠抓学科建设和全方位教育改革方面，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率先实践了中央重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发展战略，被列入教育部、财政部首批试点建设的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

2008 年 6 月，田国强教授主笔的《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被递交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府，建议注意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并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18 字综合治理方针；田国强教授参与撰写的《慎防未来粮食短缺的建议书》提出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引导国内粮价逐步与国际价格同步变化的政策建议。这两份政策建议书所反映的风险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其前瞻性和科学性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形势所验证。其后至今，田国强教授又相继完成了《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和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如何才能培养厚德博学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关于中国经济短期增长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书》、《关于促进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建议书》、《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市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关于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建议书》、《对引进海外顶尖、领军和高层次优秀人才的若干建议》、《当前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问题及其对策》、《破解制度难题，打造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固本治源，缓急相济——关于综合治理房地产危情的政策报告》、《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建议之一》、《扩大和落实高校自主权的关键是实行开放式竞争办学——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建议之二》等一系列政策建议书，得到国务院、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等上级部门的关注和肯定，其中一些建议措施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和采纳。